

在历史中寻觅普通“打工人”的声音

宋晨希

从古至今,人类留下了丰厚的历史记录,但绝大部分都是政治人物的血雨腥风、军事人的金戈铁马,抑或精英阶层的思想理论。这也难怪梁启超在《新史学》里痛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家谱而已。历史记载都是“相研书”“墓志铭”“纪念碑”“蜡人院”。很长一段时间,中外历史学家都不愿意“眼光向下”,瞥一眼普通民众。

但是,没有普通人的日常活动、喜怒哀乐,我们就无法理解不同时代里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以及国家的政策对个人的影响。正如年鉴学派巨擘布罗代尔所说,政治革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了解社会发展,便不能理解人类历史的变革。故而20世纪以来,社会史、日常生活史、微观史等理论接连出现,渴望发现普通人的声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常建华所著《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以下简称《众生百态》)、澳门大学历史学院讲席教授王笛所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年)》(以下简称《街头文化》)以及非虚构作家袁凌所著《我的皮村兄妹》,可以说是描述古今“打工人”真实生活的代表作。

《众生百态》:清代档案里的“打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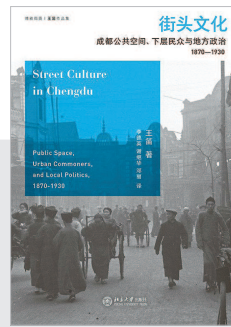
常建华的《众生百态》,让我们看到了清代打工者的境遇。刑科题本是清代的司法文书,凡是涉及死刑的案件,在制度上必须要得到中央(尤其是皇帝)的核准,所以在中央档案中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刑科题本数量巨大,其中包含秋审、朝审、命案、盗案、监狱、缉捕等项内容,最早有15万件,后续因战乱兵燹,档案受潮水人看管、遭遇变卖等情况,还剩12万件。这批档案在时间段上涵盖了整个清代,但大部分是自乾隆元年以来的案件。由于数量巨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并未完成整理开放工作,目前仅开放了“土地债务类”和“婚姻奸情(家庭类)”两个专题,但已经多达几百万宗案件,中外学者就此产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刑科题本里留下了犯罪者翔实的原始口供,保证了历史材料的真实性。

《众生百态》主要围绕剃头匠、木匠、铁匠、篾匠、豆腐铺与酒酒店经营者、挖煤者、茶山经营者、演戏伶等行业展开,考察“打工人”们的人际关系、经济纠纷、生活矛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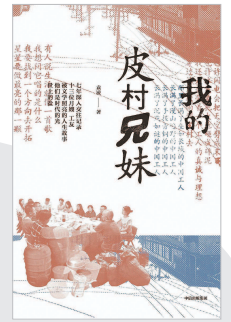
例如,清代的剃头匠年龄多在30岁以上,最大的有60岁,且几乎都在外地谋生,父母亡故者较多,属于孤独之人。清代的剃头服务,主要有为客人梳辫剃头、梳理耳窝、剃头帮工每月工钱大约四五百文。铜盆剃刀是他们的谋生工具,故而在矛盾出现时,也经常会成为作案工具。



《众生百态:清代刑科题本里的“打工人”》
常建华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出版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年)》
王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



《我的皮村兄妹》
袁凌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出版

木匠、铁匠、篾匠是清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职业,他们需要租赁店铺经营,故而很多案件都是与房东发生纠纷,也有与雇主之间因工钱产生纠纷。与剃头匠相比,木匠喜欢将斧子别在腰里,铁匠接触用具有更多,篾匠常备篾刀,都容易因激动而杀人。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清代时期,城市里的木匠行业即已有了行规,限制同行竞争,出现了本地保护政策,通过对外地木匠加倍征收行规来减少竞争。这为我们了解清代城市的商业运行,提供了资料。

通读全书,我们会发现清代权力渗透的有限性。虽然有学者认为,清代主要依靠精英阶层和保甲制度进行社会控制,但是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流动“打工人”,他们几乎靠着传统观念进行社区自治和自我控制,法律和政府处在缺失的状态,人们受到不公待遇或发生口角时,即求之于武力。

《街头文化》:对“打工人”生存空间的管理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明”观念的渗入,在精英阶层眼中,“打工人”变成了卑下、愚昧、空虚、不诚实的代表。精英阶层对普通民众进行引导,政府则开始关心“打工人”的处境。

王笛的《街头文化》就以成都为例,通过城市公共空间来看近代大众生活的转型。一直以来,王笛都在从事对成都的研究,《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四川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基层权力的社会运作。在这本《街头文化》中,王笛记录了近代中国精英阶层的改良者如何改造“打工人”生存的公共空间,让他们脱离愚昧走向“文明”。

比如,针对普通人拜佛烧香、过年贴门神等迷信行为,精英阶层在报纸上诘问商民为何一年比一年穷,原因是他

们坐在屋里什么都不干,专敬鬼神;当他们看到许多店铺因价格问题产生纠纷,店主态度恶劣,就专门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商业经营之道。1909年,四川劝业道甚至发布公告,明令要求店主不能回绝顾客开价,要端茶上烟。在成都,对茶馆的管理是最典型的案例。在此以前,茶馆主要是“聊天”和“讲理”的地方,是民众自我评判是非之地,人们有了口角就会相约到茶馆来争吵,由中间人分辨是非曲直。如果双方都不愿意认输,甚至会上演全武行,扔茶碗,丢板凳,等到了血,才会报官。近代警察制度出现之后,明令取缔“吃讲茶”,“聊天”则被精英阶层看成是“散布谣言”“制造事端”。

我们不可否认,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国家和精英阶层对“打工人”生存空间的管理过于一厢情愿。但反过来我们也能看到,当民众无法表达自我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丧失了与精英阶层和管理者协商、博弈的机会。

《我的皮村兄妹》:“打工人”尝试自己说话

不论是清代刑科题本里的记录,还是王笛对成都民众生活的研究,其所依据的历史记载都是精英所写。王笛在一篇采访中曾说,普通民众有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态度,但是也需要通过研究“历史的微声”去发现“隐藏的文书”,即对精英留下的文本进行探微式研究,从只言片语中寻找普通民众的思想、态度和行为准则。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碎片化的材料无法进行更多的下探研究。

198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皮瓦克发表《庶民能说话吗》一文,在中西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斯皮瓦克认为,庶民是无法自我表达的,因为政治、经济、法律、风俗等已被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庶民在其中丧失了自身,很难形成统一意识。此外,学者们在裁

剪资料上,使用的是有助于自身研究的内容,其目的是反映国家和社会变革,其背后也是精英意识的体现。的确,在史料中留下记载的底层民众,很多人是以犯罪者的身份出现的,被记载的也多是一些极端经历。而记录者的眼光也会造成一些民众历史形象的失真,如近代成都的茶馆里,显然大多数人是在正常聊天,但外国观察家留下的史料里,记述的多是茶馆民众打架事例,意在说明中国人的愚昧。

当然,底层民众在历史中缺少声音,还有一个原因,即古代普通人识字率低,留下的文本较少,即使有些人留下了记录,如自述、日记等,也不被重视,没有出版的机会。当下,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普通人逐渐有了机会和路径进行表达。袁凌的《我的皮村兄妹》便让我们看到了这一趋势的出现。

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是很多打工人居住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建立了工友之家,有图书室、博物馆和文学艺术小组,它成为了全国工友心中的“梦想地标”。皮村此前春节时还曾举办“打工春晚”,网络点击破万。工友之家门口的两行标语颇能反映普通人对自身诉求的过去:“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与其他描写打工群体的作品不同,袁凌花费了七年时间,与13位打工人深入交往,同吃同住同劳动,记录了他们的人生和遭遇。这些打工人参与了文学小组,心底埋藏着文学梦,有表达自我的诉求。

月嫂史鱼琴身患癌症,还有一个长期患病无法工作的老公,她在养病期间写小说,真实记录自己的过往。她告诫自己:“赶快写,哪怕怕了,写出来就没有遗憾了。”

同心二手商店店员小海,因为所住地方的公厕无人清理,苍蝇横飞,他写下了《尹各庄的苍蝇沦陷了》。虽然他辗转各地打工,报酬微薄,但对生活充满信心,喜欢读海子,听汪峰的歌曲。他对未来同住同劳动,写下“晚风吹过窗台/梦想依旧澎湃”。

现在皮村已经走出了范雨素、陈年喜这样的知名“打工人”,他们出版的《我是范雨素》和《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等作品为世人所知。皮村的很多打工人受到他们影响,也开始阅读,写作,思考自己的命运。

当然,“打工人”的“说话”,也存在种种困境,比如他们只能写自己经历过的事,诗歌和文章在写作技巧上还有差距。但我们能看到,如今的普通人已经在努力言说自己。千百年来,无数底层普通人来到世界,又匆匆离开,如同流星划过不留下半点痕迹。现在,他们正在努力自己说话,让世界知道他们的困境和情感经历。



《策展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幕后故事》
[美]兰斯·格兰德 著
王璨 高华光 译
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出版

与《策展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幕后故事》作者兰斯·格兰德素未谋面,但通过对这本书的阅读,感觉已认识良久,仿佛与他一道,坐在旷野的晚霞中沉思自然的浩瀚无际,以及这无边中人类渺小尘埃又浮沉沉的历史。由远及近,便是落入细小视野中,一位策展人以丰富的人生阅历为底色的职业生涯,这职业又链接起科研工作者和博物馆,还有更为广阔的文化历史与自然,由近又远。

这是怎样奇妙的循环往复、勾勾相连!当你拿起这本书,这种惊奇之感便在不经意中涌现出来。作为一本“幕后故事”书,其故事性天然具有对读者的吸引力,加之这本书的叙事脉络非常清晰,无论你是否造访过菲尔德博物馆这家世界著名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你都可以轻松开启一段博物馆的探寻之旅。

作者以时间为轴线介绍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起源与发展以及策展人的职责变化,在这一框架下,开始了非常个人化的讲述。从大学时代偶然得到的礼物——化石标本讲起,它改变了作者的人生轨迹,使他商学院转入科学领域;再讲到他早年经历了支序分类学兴起过程中的观念冲突,从中体会到科学是在动态的斗争中前行,而后成功应聘为菲尔德博物馆策展人。种种因缘际会,引导作者选择了策展人这一职业。策展人只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头衔

逍遥阡陌上,远近皆旧识

王璨

吗?策展人究竟要经历什么?要解决什么?要成为什么?作者并没有简单给出论断,而是从容不迫地讲述自己成长为策展人的过程中影响他的人和事。策展人需要进行科学发现,增加博物馆馆藏。作者在怀俄明州建立自己的野外考察点,与墨西哥古鱼类学之父开发墨西哥采石场,与生物学教授合作获取鱼标本,他那些菲尔德博物馆的同事们在不同研究领域各有建树,这些都可看作自然历史博物馆策展人在全球范围内尝试构建多样藏品的典范。

作者并不止步于自己熟悉的古生物学领域。他不断拓展的工作经历与逐渐增长的见识,使他立足更广阔的平台去理解策展人的工作。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使命乃至整个科学事业。他担任副馆长期间,开展了各种行政管理工作,包括管理部门内部工作、与博物馆其他团队的互动以及与博物馆以外的诸多实体的合作。菲尔德博物馆主厅四个角落安放着的四座缪斯女神雕塑,它们寓示该博物馆的核心使命——科学、记录、研究和知识传播,作者担任的行政职务的主要职责就是帮助博物馆行使这些使命。

本书还着重探讨了策展人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面临的挑战。比如博物馆里的人类遗骸收藏工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它提供了对人类生理学、人类信仰体系等直接可观察的记录,但人类遗骸藏品的管理也面临道德挑战,涉及了文物返还、收藏伦理和法律问题。管理层面亦无法回避的一些问题——如何维持庞大的藏品,如何解决研究人员不断增加的成本等等,这些可通过加强博物馆与机构间的合作来予以应对。

挑战日趋严峻,与之相伴的是作者更为深切的忧虑。从猎杀食人狮惊心动魄的往事,到现在科学家们更多关注狮子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时过境迁,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由

此可见,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策展人和藏品在生态系统保护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作者尤为关注美国日益严重的科学文盲现象,认为策展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理想人选,鼓励策展人重视公众参与的科普活动。

作为探究现象背后奥秘的学科,自然科学给我的感受是深邃茫远的:无边无际的星空、绵延广阔的自然。初读这本书,我也曾以为这段旅程会在潦草的翻页中匆匆结束,可细细品读,竟觉出自然科学的可亲与有趣:星空仿佛近在咫尺,自然便是广袤中的草木花果,是各种动物的张弛与生息;至于那凝固了几千万年时光的化石,它们是时间的碎片,一闪而过地球的过往种种。让读者由陌生到亲近,甚至是喜欢,作者下足的功夫凸显出这本书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这本书图文并茂,叙述方式不刻板,不说教,没有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让人只能仰望。书中俯拾皆是幽默总能让人会心一笑。这种平易近人的学术态度本身正是对作者大力提倡“公众科学”一词的回应。这本书既有学术研究的严谨性,也有科普读物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例如,他策划格兰杰宝石馆这一跨学科项目的幕后种种,不仅可以读到展会购买宝石的故事,还有不为人熟知的神奇探秘经历。宝石馆代表性展品的璀璨夺目、展览捐赠者的慷慨解囊以及展线设计的别出心裁,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这本书内容丰富有趣,这源自作者及其同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探险经历的亲身经历。这些极具个性化的体验,传达出一名优秀的自然历史博物馆策展人必备的素养:他们不但对专业领域有深厚研究的科学家,还是科学知识的传播者,是博物馆馆藏的拓充者,是永远“在路上”的探索者。例如,书中关于已逝策展人卡尔·帕特森·施米特为科

学献身的事迹感人至深,这位重要的爬行动物学家不仅学术成果斐然,还从事大量的野外工作,甘于冒险收集各种宝贵标本。他在检查非洲树蛇时被咬伤,毒发身亡前仍坚持记录身体症状,以增加人类对非洲树蛇致命毒液的认识。

再次,这本书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它鼓励在科学领域不断挑战教条和权威,破除偏见与迷信。它对博物馆如何寻求科学价值与法律风险、伦理道德的平衡,以及环境保护等关乎人类命运的重要问题,有着面向未来的长远思考。作者正是这样身体力行,通过写作唤醒公众对自然和文化的好奇,讲授课程鼓励学生探索发现和发现的热情,培养新一代潜在的科学家。

这本书可以让读者增进对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了解。隔着展柜玻璃,你会豁然明白,藏品不是从天而降,它们是策展人竭尽所能不断发现与构建的成果。从藏品变为展品,绝非随意,它们的位置摆放以及叙述语言等等,无不凝聚着策展人的审慎与智慧。如菲尔德博物馆标志性展品——“恐龙”“苏”,从发现、引起纷争、入藏博物馆到展示给观众,整个过程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色彩。读过本书后,那些作者以亲历者身份进行的细致描写,定会让观众在欣赏展品时生发出不一样的感触。

自然科学如同脚下的土地一样真实、可感,它切切实实关乎我们生存的环境,不仅是回首过去——追溯宇宙诞生的之初,立足现在——人类与自然生态的种种相互影响,更是面向未来——我们如何预见困境,改善环境,寻求人类的发展。

相信拿起这本书的读者定能开卷有益。说不定,它会成为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悄然发芽,成为阅尽人世后不一样的转身回望,成为认识自我、了解世界、理解存在的一次凝神屏息。

重读《歌德谈话录》

郁元宝

但凡重要的新书甫一出版,报刊杂志便会很快刊登应景适配的读后感或评价性文字。历史上许多卓越的书评随笔就出于此等“捷才”之手。

我年轻时拿到一本新书,也能洋洋洒洒写出一篇并不太坏的文章。如今眼花腰酸,反应迟钝,再也不敢逞心喜了。

唯其如此,就愈发佩服伟大的歌德观察体验之精细。他说“天才”(也应包括善写书评的“捷才”)都需要身体基础,健壮而不知疲倦,像拿破仑指挥战役,几天几夜不睡觉还精神饱满。他回忆自己年轻时经常被灵感驱使而奋笔疾书,沉静之后发现一幕精彩的戏剧,一些闪光的诗行,一段动人的小说情节业已宣告诞生,晚年虽依旧健康,但精力不济,只能少写,慢写了。

歌德不相信物质刺激能焕发本有的天才。他告诉秘书兼助手爱克曼,席勒书桌抽屉里总是放满腐烂的苹果,那种气味令他头晕目眩,却让席勒神清气爽,文思泉涌。歌德还建议爱克曼,倘能自控,不妨少量饮酒,帮助写作。爱克曼搜集的《歌德谈话录》确实留下了他们师徒小酌怡情的许多动人场景。

朱光潜所译《歌德谈话录》1978年初版,我书架上这本是人文社1985年第4次印刷。扉页上有当年稚嫩的签名,并写着购书时间:1986年4月8日。

不记得这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了。总之,是临近本科毕业并已决定读研究生的那段时间,听了先师蒋孔阳先生的建议,特地去复旦校门口新华书店购置的。

几十年来我不停地翻看这本书,许多内容已烂熟于胸。若说我私下谈论它的频率超过某些国学发烧友引用《论语》,恐怕与事实也相去不远吧。

歌德谈话录范围极广,包括古希腊罗马和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以来众多历史事件、政治学说、哲学和艺术思潮,涉及难以数计的哲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举其荦荦大者,就有英国的莎士比亚、司各特、拜伦、穆尔、边沁、卡莱尔、法国的高乃依、博马歇、莫里哀、狄德罗、伏尔泰、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意大利的但丁、西班牙的卡尔德隆、德国的康德、谢林、黑格尔、席勒、穆勒兄弟、有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家,达尔文、牛顿等科学家,文艺复兴以来众多画家雕塑家,包括中国明朝的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当然,还有歌德本人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与颜色学、光学、植物学研究。

我岂能仅仅因为这是摩挲已久的珍藏,就自信能写出与之相称的书评呢?我只能再次捧出这本发黄的小册子,记下不同时间阅读它的点滴感受。

有段时间我是跟蒋孔阳先生大谈生活上的苦恼,以及自以为是的“思想”。他劝我去看《歌德谈话录》“两个时代说”。这是歌德与爱克曼1826年谈话的头条,朱译加了小标题,“衰亡时代的艺术重主观,健康的艺术必然是客观的”。

我明白蒋先生的用意。他给毕业生留言,最爱抄录《浮士德》名言:“人要立定脚跟,向四周观望;这世界对有为者并不默然。”世界很大,人应该冲出小我,不可画地为牢。但我总觉得“两个时代说”未必完全正确。反之也可以说,衰亡(走下坡路)时代的艺术往往追逐客观世界的表象,健康的世界精神则鼓励艺术家真正关切并尊重内心时代。歌德顶多只对了一半。

《歌德谈话录》如散金碎玉,却并不缺乏类似“两个时代说”的纲领性思想。不必说歌德与席勒共同感兴趣的“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异同了,以另一个巨人拿破仑为话题,歌德也发表过不少惊世骇俗的议论。他经常因为拿破仑征战埃及及时行乐里带着“少年维特之烦恼”而毫不掩饰地沾沾自喜,但他对拿破仑的好感绝不仅仅因为拿破仑重视他个人的作品,而是赞赏拿破仑所代表的法国革命时期弥漫欧洲的积极进取的文化。

德法两国当时有激烈的利益冲突,但歌德说:“法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养的,我自己的文化教养大半要归功于法国人,对这样一个民族我怎么恨得起来呢?”他关心文明与野蛮之辩,超过国族利益之争。歌德还发现:“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但是也有一种文化水平,其中民族仇恨会消失。”他庆幸自己60岁之前就“坚定地站在这种文化水平上面了”。

由此出发,或许能更好地理解歌德谈话录首次提出、至今仍被东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世界文学”的概念。

歌德时代一些有考据癖的学者动辄指斥莎士比亚或其他作家笔下某个人物来自古希腊罗马的虚构,并因此抹煞莎士比亚等人的创作。歌德鄙视这种“历史批判”。他不认为那些考据得来的“可怜的真实”有何益处,“罗马人既然足够伟大,有能力虚构出这样的传说,我们就没有一样伟大的品质去相信这种传说吗?”

关于古希腊罗马的记载是否属实是一回事,但在古希腊罗马大师名下的作品本身价值如何,则是不容回避的另一个问题。如果说它们是虚构,那就请您也虚构一下试试?

关于莎士比亚和拜伦,歌德有说不完的话。他说这两位兼生存空间太逼仄,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说都是监狱。他认为莎士比亚过于丰富雄壮,德国作家最好每年只读一部莎剧,否则会被“压垮”。他最怕听人奢谈“独创性”,“如果我算一算我应



郁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歌德谈话录》
[德]爱克曼 辑录
朱光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的一切也就不多了。他讨厌批评家们一旦发现作家作品之间有相似性,就惊呼“抄袭”。歌德既有害怕被“压垮”的“影响的焦虑”,也渴望并感谢其他作家的影响。他经常如数家珍地告诉爱克曼,自己受过哪些本国和外国作家的滋养。

不可不读朱光潜的注释。朱先生翻译并注释此书,中心任务是要证明恩格斯经典论述的正确性,即歌德既是天才,又是庸俗的魏玛权贵顾问。

但歌德的自相矛盾并不总发生在天才和庸人之间。他期待“世界文学”早日到来,却仍推崇古希腊为不可超越的典范。他相信灵魂不灭,却怀疑三位一体。他告诫爱克曼别在乎批评,却不停地抱怨国内外读者对他本人的指责。他大谈天才,相信父母年轻健康或年迈体弱时生育的子女将来身体和智能会有难以跨越的差距,却又鼓励爱克曼努力学习,勤于观察,不可坐等灵感自动降临。他似乎总能保持平和睿智的风度,但偶尔也会发出梅菲斯特菲勒斯的恶毒讥讽:“我没有感到有必要去看关起来的疯人,在世自由行走的疯人我已经看够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歌德甚至忽略了《维特》而轻生的青年,居然说什么“这部作品至多也不过使这个世界甩脱十个毫无用处的蠢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去做,只好自己吹熄生命的残焰”。

这些矛盾让歌德看上去不够完美,却真实。

初见爱克曼,歌德就谆谆教诲他不可制定庞大计划。要从小事做起,比如写些小散文,记录旅游时各地风物的观察。但歌德又规劝爱克曼须力戒小气,敢于抓住宏大命题。他经常深情回忆自己和席勒在“狂飙突进”时代如何不断写出佳作力作。

爱克曼没有记录他每逢这时作何感想,我则油然想起《傅雷家书》。歌德和傅雷教导晚辈,都难免一厢情愿,越俎代庖。这或许让有些年轻人吃不消,但现在的我倒宁愿把他的絮叨视为老年人爱才惜才之情真挚的流露。

爱克曼原著三大本,朱光潜只是摘译。不解渴的书虫或研究者不妨去追读全本,但对一般读者而言,兴许这样的篇幅也正合适吧。

2024年9月17日 中秋